



试论台湾媒体教育社团的社会实践策略

时间：2002-8-18 14:32:06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浩荣 阅读1166次

“理论的批判还不足以摧毁现实的不合理性。只有从事合理的实践，才能为理论的批判增添力量。” - Herbert Marcuse.

任何形式的知识论述，贵在社会行动者能将抽象的学术符号，具体化作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力行践履之。其中尤以批判教育性的知识为要，因为这类知识论述在形成过程中，便将“改革社会、迁善世界”的理想与目的铭刻于本质中：不只是一要批判社会的不公义现象，更要将之具体消弭，重构出完善、公平的社会形构。

批判教育知识的传播，乃是经由主体与主体间的言语沟通；而批判教育理想的实现，更须透过不同社会主体的集结、串联，成就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改革力量，在社会场域中不断地将这些知识化为各类抗争的实践（包含在地的以及总体的抗争），方能冲撞现存的不合理体制与结构，也才有推动社会以臻于理想境地的可能。

目前国内已有数个媒体社运团体，其规模大小、成立宗旨、成员组成、运作方式及行动理想等虽不尽相同，但“推动某种程度的媒体教育 / 媒体素养”则是各媒体社团间彼此间的公约数。对于任何的媒体教育机制而言，前述的“知识-行动”理念是绝对必先了然于心的。睽诸当前的媒体教育，多半是先采取一种批判式的视角来解读媒体迷思，之后再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以供阅听众日后用以辨析媒体内容、批判媒体霸权，甚至是从事媒体抗争（包含写抗议信函、打电话申诉、发起消费者运动等）。

这样的媒体教育策略，泰半是从阅听人的视角出发，告诉阅听人该怎样作，才能成为一名具备媒体素养的媒体公民。然而，对于媒体社运团体本身，他们在媒体教育中应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有何具体实践路线？这类论述显然是较为缺乏的。职是，笔者试图就媒体教育层次上提出几个策略方向，以供媒体社运团体在媒体教育的推动上，有所参考：

一、对全体公民分层进行媒体素养活动。此即一般对于“媒体教育”的常见定义，亦即是对阅听大众直接进行知识赋权（knowledge empowering）的动作。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媒体教育的对象绝对不仅止于未成年的儿童及青少年，成年的社会公民同样是媒体教育的实行对象。我们终日生活在一个媒体讯息无孔不入的后工业社会里，媒体（不论是媒体内容、意识形态乃至外显实存的媒体权力）对于我们的影响绝对是随着媒介使用时间的增长而攀升。故而，对于一个有意推行媒体教育的社团而言，其应赋权的对象绝对不只是儿童与青少年，而是当今媒体社会的每一位公民。

这类型的媒体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已经有段时日，而媒体素养的推行方，实乃不一而足。但简单来说，可依教育对象的族群特质（包括：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使用不同的媒体形

- 纽约时报的实习生制度
- 核心期刊与研究生教育
- 新闻教改遭教育界质疑
- 日本新闻教育改革现状
- 当前新闻教育错在何处？
- 新闻改革新思路 and 新闻...
- 新闻摄影教育，我们为...

式、论述方式、内容深度来实施媒体素养。例如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吴翠珍教授所规划的公视《别小看我》节目，便是特别针对儿童族群而设计，透过声光效果兼具的电视媒体作为教学媒介。

二、加强对教师、家长的媒体知识交流与联系。显然的，这个策略取向的表面诉求对象虽是师长，但实质的预期有效对象却是未成年的儿童与青少年。教师和家长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两大机制 - 学校与家庭 - 中，同样扮演着相当重要的“指导者”与“范型”的角色，对于孩子与学生而言有着不可言喻的潜化力量。因此，媒体教育社团除了直接对目标对象进行诉求与施教外，亦应对教师、家长这些社会化的主要媒介（agent）推行媒体知识的涵养，以期透过“亲子互动”、“师生互动”等潜在的社会化力量，间接地散布媒体知识，落实媒体素养于日常生活中。

此外，社团亦应与教师及家长们保持沟通对话，以了解他们在初级团体（家庭）与次级团体（学校）传播媒体素养时，可能遭遇的实质阻碍或成果，从而尽可能地提供软件及硬件上的支持与协助；并竭诚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以此作为社团日后工作方向的修订依据以及媒体素养内容的改良基础。

三、积极吸收媒体教育义工，特别是大专青年。媒体教育社团推行媒体素养的目标主要有二：（a）就短期而言，是透过媒体知识的交流，期能协助阅听众以较为完整且全观的视角来透视各类媒体迷思，过滤不当的、虚假的媒体讯息，但这无疑地属于较为消极的层次；（b）就长期而言，媒体教育终极且积极的理想，毋宁是凝聚媒体公民的力量，共同推动媒体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与迁善 - 特别是对商业媒体恶质竞争的社会而言。

然而，任何理念一旦提升到社会运动的层次，便不可能以单枪匹马之姿而竟功，这无异是不切实际、昧于现实的作法。媒体教育社团势必经过各类管道，积极招募、争取具有相同理念、富有行动力与战斗力的成员来参与各项媒体教育及媒体改革的社会运动。但是，综观国内各大媒体社团，多半有着经费短绌的经济压力，是故，为了撙节开支，必当以社团的理念与行动为号召来积极吸收义工，共同成为媒体教育与改革的推手。

理想上，义工的成员组成毋宁是以能够涵盖社会各层级的公众为佳，不仅能够取得意见多样性，也能使社团本身更具社会代表性。但睽诸现实考量以及过往的行动经验，真正能够不断参与媒体教育社团举办的各项媒体素养活动、参加改革媒体环境的抗争活动者，几乎以大专青年学子为最。社会人士（包括家长、教师、学院人士等）泰半囿于繁忙工作以及家庭因素，即便认同媒体教育的改革理念，但也经常无法亲身参与社会活动，故而多以精神上的支持或经济上的援助替代。

因此，青年学子无疑是媒体教育社团在教育理念的实际行动中，最主要、最根基的战斗力量。

C. Wright Mills曾在《权力菁英》书中积极指出：“目前，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是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动力。” Herbert Marcuse也特别看重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诚然，笔者必须强调的是，媒体教育与改革运动，需要的绝对不只是青年知识分子，更需邀集社会全体公民的认同、动员与参与，才能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但基于现实因素的诸多考量与局限，社会各层级的公民对改革活动的参与以及对媒体教育社团的支持，逐渐衍生出形式不等的实践方式：无暇参与实际行动者，便以精神支持或提供捐款；有余裕参与行动者，便亲身投入每次的活动与抗争。但就执行层面而言，媒体教育与改革行动绝对需要大量人力的参与，因此，以大专青年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便是这些社团在行动上的中流砥柱。

此外，由于大专青年（包含研究生）将于毕业后投身职场，媒体教育社团倘若能先行争取大专青年对于媒体教育、媒体改革的认同与支持，传输他们相关的媒体知识与、揭露当前媒体环境的弊端，多少有利于媒体改革的动能流注到现存媒体结构当中，以滴水穿石的方式逐渐将媒体改革的意识渗透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实践当中，期待最终能由下而上、聚沙成塔地转变百

病丛生的媒体内在产品以及外在媒体结构。当然，这将是一条长而远的改革道路，不仅需要时间的辅助，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外部奥援以及媒体公民不断地藉由消费者运动等方式进行各项抗争。唯有当各项媒体教育、媒体改革运动声气相通、沆瀣一气，方能集结汇聚出最坚实有力的变革能量。

基于上述诸项理由，媒体教育社团不仅需要积极招徕社会各界的认可、资助与参与，更应特别侧重青年学子这股强大改革潜力的开发与培训。任何放弃开发青年义工的决定，势将自绝于源源不断的年轻后劲动力，无疑是自毁长城的愚昧作法。

四、积极开拓、维系媒体教育社团的各界人脉。此方大致可分殊为三项，一一说明如下：

(1) 建立并保持与其它媒体社团的紧密联系与信息交换。社会改革的目标，绝非任何个人或社团单打独斗所能完成，而是必须汇聚最大的行动力量来与现存社会体制进行冲撞、抗争。是故，就媒体教育与改革运动而言，媒体教育社团不仅不能乱枪打鸟地各自为政，更不应以妄自尊大的心态睥睨其它社团，而应保持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保留在各项媒体议题上的合作空间。

(2) 建立并保持与各大媒体的联系。诚然，就媒体抗争的立场而论，各家媒体自然是媒体运动者的批判对象，但是“批判对象”不尽然等同于“敌人”，不必全然排挤拒斥之。尤其，对于媒体教育社团而言，改革媒体环境的策略并非只限于发动公开的抗争活动，事实上，倘若社团与媒体间有一定的交情，彼此互尊互重，社团在针对不当的媒体乱象提发公众抗争前，可先经由公关策略对媒体单位进行私下劝说，亦有可能因此耗费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媒体改革的工作（注1）

。（诚然，这种改革的可能，多半仅出现在微观的媒体内容的抗争上，而非宏观的媒体结构问题）。

此外，社团在推行媒体素养的倡导活动时，也经常需要来自媒体业界的具体协助，诸如：邀请实务人士演讲、媒体文本的租借使用、相关信息的提供、媒体工作环境的参观等，在在都需要媒体业界的配合与赞助。是故，尽管媒体教育社团多半从事批判媒体的工作，但实也必须与媒体业界保持一定的联系。

(3) 凝聚社团义工的向心力与感情。“义工”，顾名思义，是自发性的义务工作者，与社团之间没有法律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可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权力从属关系。维系在社团与义工之间的，实乃理念的认同、情感的交流、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一份对于彼此的尊重。因此，社团不应将义工人员视为宛若约聘人员般的劳动力，反而更应对义工人员增添一份感激与敬意 - 不论义工人员的年龄、性别、阶级与族群为何。

当媒体教育社团以其理念招来若干义工的参与时，社团便应思考如何将这些志愿义工编制成一股长期的、非正式的常备力量，换言之，要设法留住义工，并设法拉拢新的义工成员。设若以功利的角度观之，要达成前述目的，经济成本最低的途径便是“友谊情感”的培养-经由社团内部成员与义工们不断地进行情感交流，逐渐开启义工对于社团的高度认同，深度融入社团内部，甚至视自己为社团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如此，义工人员自然更乐于参与社团的各项活动，也能自发性地引领其它朋友共同加入社团工作的参与。简言之，唯有重视社团自身与义工人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彼此互尊互重，才能促成“雪球效应” - 义工人数宛若滚雪球般日渐壮大，也为社团未来在媒体教育、抗争与改革路途上，提供源源不绝的人力及知识资源。

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结合媒体教育的理念以及笔者亲身的行动经验，试图提出数项媒体教育的具体实践策略，以供媒体教育及媒体改革社团略作思考，也期望国内的媒体环境，能随着媒体公民素养的提升、媒体改革运动的进展，能有臻于完善的一天。

结语：发展融合在地特性的媒体教育最后，笔者再提出一个现象稍作讨论。亦即，部分从事媒体教育的人士以为，国内的媒体教育便是将西方国家（如施行媒体教育行之有年的英国）经验与制度，加以复制并应用于国内社会。笔者必须指出，这种不加思索、一味移植西方理念的取径，本质上便是昧于本地社会现实的落后思维。

诚如前述，教育知识的特性之一，便在于其中蕴含了将知识实践于日常生活（不论是其所欲结果是维持社会现状抑或改革社会现状）的特质与前提，因此，教育知识以及教育体制必须具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在地性，才能期待教育知识能够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顺利地、无所扞格地化为各项社会实践。

是故，台湾的媒体教育，绝非是要再成为另一块西方知识的殖民场域。理想中的媒体教育，固然必须借镜西方长期以来的宝贵经验，然而是要批判性地、有选择性地将其之撷取，并同时考察台湾媒体环境的外在结构与内在文化的问题与特质，揉合二者，重视西方国家与台湾本地之间的差异，据此截取西方之长，修补在地之短，进而发展具备本土特色的媒体教育知识与体制。

或许，教育的哲学理念，可能真有一种超越历史性、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思维（当然，后现代哲学斥之为无稽），但是媒体教育并非玄虚式的哲学理念之探讨研究，而是富有社会实践意涵、推动社会进步的经世致用之学。媒体教育者必须本着丰厚的媒体专业知识，同时对于当代社会环境、媒体环境的脉络变迁有一定认识者，才能充分地将媒体知识与教育理念做出最理想的构连接合。倘若空有满腔教育理念，却不愿敞开心怀去认识、接纳当代的媒体环境，不愿认真汲取媒体相关知识，恐怕将是徒劳无功。

注1：富邦文教基金会曾于民国88年，依此途径，劝阻华视停播辣妹钢管秀的节目。详见张锦华、黄浩荣着，《监督媒体DIY》，2001：p. 69-85。

文章管理：web@cddc.net（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试论台湾媒体教育社团的社会实践策略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投稿信箱◆会员注册◆版权声明◆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